

# 後解嚴時期西川滿文學翻譯的文化政治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 中文摘要

本論文主要著重於西川滿（1908-1999）文學翻譯的文化政治。其譯介活動因作家的政治身分與皇民文學論，在戰後的台灣文學場域始終備受爭議。然而，在後解嚴時期台灣民族主義意識高漲，強調台灣文化起源的多元性，使得戰前在台日人的文學成為眾多之一，他的作品也才得以藉由「翻譯」的路徑重新被閱讀認識。

本論文將以西川滿被遣返後的文學譯本作為主要的討論範疇，釐清在戰後日本遣返者文學中西川滿文學的書寫特點。又，解嚴前後台灣跨語譯者如何擇譯他的台灣書寫，藉以提供建構台灣文學主體性的論述資源。藉此強調西川滿文學的台灣鄉土性，試圖翻轉西川滿戰前既定的作家形象。然而，這些後殖民譯本並非是台灣本土派所主張的寫實主義的「鄉土」，而是充滿作者浪漫懷鄉的「鄉土」。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所背叛的並非是語意的背離，而是為因應文化政治的論述所需，「鄉土」是他們最大的公約數，成為九〇年代讀者重新閱讀理解西川滿文學的另一個重要的視角。

關鍵詞：西川滿、遣返者、翻譯、文化民族主義、鄉土

# **The Cultural Politics in NISIKAWA MITURU'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during the Post-martial Period**

Wang, Hui-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NISIKAWA MITURU (1908-1999), the cultural politic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Hi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ave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because of hi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the theory of imperial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Taiwan literature after the war. However,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during the post-martial period, it emphasized the diversity of the origins of Taiwan's culture, therefore it let his work to be re-read and understanding by the “translation” path.

The paper was based on NIKAWA MITURU's literary translation as the main topic of discussion, after his repatriation from Taiwan to Japan. And try to clarify th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NIKAWA MITURU in the Japanese Repatriate Literature after the war. Moreover, how Taiwanese translators choose his Taiwanese writing around the period of the end of Martial Law,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structure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 literature. To emphasize NIKAWA MITURU's

Native soil of literature, trying to reverse his stereotypical writer image before the war. These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s, however, are not realist “native soil” native which the Taiwanese advocates, but rather “native soil” which is the author’s romantic homesicknes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betrayed is not a departure from the semantic, but in response to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required. “Native soil” is their greatest common denominator, and it is another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readers of the 1990s to re-read and understand NIKAWA MITURU’s literature.

**Key words:** NISIKAWA MITURU, repatriate, translation, cultural nationalism,  
native soil

# 後解嚴時期西川滿文學翻譯的 文化政治\*

## 一、前言

七〇年代的台灣在政治上開始「回歸現實」，文化上回歸台灣「鄉土」，為日後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奠定基礎。八〇年代台灣民族主義者藉由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運作試圖「重構台灣」，八〇年代下半葉起台灣民族主義文化論述如浪潮般席捲而來，這波文化論述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強調台灣文化的多元起源<sup>1</sup>。他們為了與官方的文化論述有所區別，本土性雜誌《笠》和《台灣文藝》的成員開始強調台灣人的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日本統治時期對台灣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被殖民的歷史變成另一項「資產」，不再是國民黨教化宣傳所汙名化的「負債」<sup>2</sup>。九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在民主化浪潮裡伺機「正名」，取代戰後在中華民國文藝史觀主導下，被邊緣化的台灣「鄉土文學」、「在中華民國的台灣文學」等名詞。然而，台灣文學所包括的範圍、定義等問題，卻依論者自身的身分認同、國族意識、文學史觀等因素，呈現各持己見的爭鳴狀態。

解嚴後台灣文化場域的文學題材更形多元化，他們曾被壓抑的歷史記憶，在威權體系鬆動之際不斷湧現，女性文學大量出現，以抗拒男性中心論述；眷村文學抬頭挑戰黨國中心論；原住民文學大放異彩，挑戰漢人中心論；同志文學批判異性戀中心論。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學趨勢與景況，不僅在重新

---

\*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解嚴後臺灣跨語作家翻譯活動的文化政治」（NSC 104-2410-H-007-049）之部分成果。本文於天理台灣學會第26回研究大會（2016年7月2日）發表時，承蒙中島利郎教授提供寶貴意見。另外，感謝匿名之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提供筆者參考修訂，謹此致誌。受限於字數規定，論據未能具陳，將另文補充，特請海涵。

<sup>1</sup>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頁211-216。

<sup>2</sup> 蕭阿勤，〈追求國族：198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思想》第22期（2012年11月），頁90。

建構新的台灣文化主體，更重要是他們強調彼此的差異性，性別的、族群的、階級的差異，構了解嚴後台灣文學發展的主要特質<sup>3</sup>。

台灣日語文學的整理出版活動，九〇年代前衛出版社出版台灣作家全集。之後，政府文化單位也隨之投入國家資源著手整理、翻譯、出版戰前台灣日語作家個人全集，例如楊逵全集、張文環全集、龍瑛宗全集等。然而，自七〇年代末起的幾波台灣日語文學的翻譯活動裡，雖有譯者曾多次譯介西川滿文學作品，但卻仍有所顧忌，甚至因此引爆皇民文學論爭。直到九〇年代後陳千武、葉石濤、張良澤才又重新啟動翻譯西川滿文學的作業，在報紙副刊上譯介他的台灣書寫。

返日後的西川滿雖早已退出台灣文學場域，但他卻仍執意以「台灣」作為他的小說舞台，在日本文藝界生產許多書寫台灣的文本。他也與戰後日本一些殖民地遣返派作家有其類似的喪鄉之感，但他卻以書寫台灣「原體驗」<sup>4</sup>的方式維繫與台灣超越時空的情感連結。因此，在九〇年代複數歷史記憶的召喚祭典中，他的文學也以翻譯文學的形式重新被迎回台灣文學界，他的記憶被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算數」<sup>5</sup>了。因為文化民族主義者認為民族認同主要是個意識問題，它的基礎在於將民族獨特的歷史地理所產生的特殊生活方式加以內化，而非僅僅參與當前國家統治下的社會政治過程。因此，文化民族主義者經常致力於保存、挖掘，甚至「創造」民族文化的特殊之處，認為這種文化特殊性是民族認同的基礎<sup>6</sup>。台灣跨語世代的翻譯家們在戰後，亦試圖藉由「翻譯」重新「保存、挖掘」，甚至「創造」台灣民族文化的特殊之處，藉以突顯與中國民族文化的異質性，戰前在台日人生產的文學文本便成為台灣文學另一種特殊的文學內容。

<sup>3</sup> 陳芳明，〈複數記憶的浮現：解嚴後的台灣文學趨勢〉，《思想：解嚴後的台灣文學》第8期（2008年1月），頁131-140。

<sup>4</sup> 尾崎秀樹，〈外地引揚派〉の發言——歴史の傷痕とからみあう作家たち〉，《旧殖民地文学の研究》（東京都：勁草書房，1971年），頁321。「殖民地遣返派作家」和「原體驗」的用詞皆源自本文。

<sup>5</sup> 此語出自朱天心的〈古都〉：「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古都》，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151。

<sup>6</sup> 本文有關「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定義轉引自蕭阿勤的《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同註1，頁54-55。

因此，本文將以台灣跨語世代的翻譯者陳千武譯介西川滿返日後的文本為主要討論的範疇，探討解嚴後台灣本土論述如火如荼地展開之際，他如何介入西川滿文學翻譯文本的生產活動中？因時制宜地擇譯了哪些作品？這些作品又折射出譯者怎樣的國族意識與文學史觀？在帝國時期作者與譯者的民族關係曾是相對立的，然而戰後為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論述之需，卻積極譯介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譯者選譯的目的性與原著創作動機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翻譯的悖逆性？

以下將依序釐清在日本遣返者文學中，西川滿書寫台灣的特殊性，探討翻譯者陳千武擇譯哪些西川滿戰後的文學文本，刊於本土性的報紙副刊中？其譯作的內容如何與戰後台灣社會產生連結？思考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在建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過程中，面對前殖民者的文學時為何欲去還留，他們如何藉由翻譯這些戰前在台日人的鄉愁文學折射出台灣當代的懷舊情感，在台灣「鄉土」之上共構屬於他們的殖民地記憶，形成另一種舊帝國的集體記憶。

## 二、日本遣返者文學中的台灣書寫

1945年8月15日日本敗戰後散居於中國戰場、滿州、朝鮮、台灣、南洋等地的軍人和居住外地的日人約六百多萬人，紛紛從海外各地被遣返回日本。相較於其他戰區，台灣是最平和的地方，因而被日方設定為最後執行遣返作業的區域。日本政府先讓日本軍人在台就地除役，並向美軍商借遣返船隻遣送日人歸國。前後共有六次遣返作業，其中前三個梯次的規模較大，第一次大規模的遣返作業始於1946年2月21日到4月29日止為期兩個多月。第二次遣返作業於1946年10月至12月，主要遣返的對象是「留用日僑」和「殘餘日僑」和沖繩籍民。1947年2月台灣因爆發二二八事件，島內社會情勢丕變，國民政府緊急解聘「留用日僑」，於1947年5月展開第三次大規模地遣返作業<sup>7</sup>，這群在台日人因而結束他們的殖民地生活。

<sup>7</sup> 河原功，〈《台灣引揚者關係資料集》解題〉，《台灣引揚者關係資料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社，2011年），頁3-12。

在台日人返國後積極地投入生活重建的工作，其中「全國台灣引揚民會」的成員多為「引揚者團體全國連會」的核心幹部，並支持該連會營運的開銷，亦足見台灣遣返者在遣返者組織中活躍的情況<sup>8</sup>。由於他們被遣返的過程較為平穩，比其他地區的遣返者更早美化台灣時代，望鄉之念也較其它地區的遣返者更為強烈<sup>9</sup>。

戰後日本政府為了安頓這群約佔全國人數一成的海外歸國僑民和除役軍人，面對相當嚴峻的施政課題。官方藉由建設戰後「民主主義」、「文化國家」等概念的闡述，肯定這群歸國者「為國犧牲勞苦功高」的社會價值，試圖儘速將他們收編納入日本國內的公共論述中。然而，在戰後社會集體記憶重新整編的過程中，卻忽略了這群遣返者有其「加害」和「被害」的雙重身分，致使他們將戰前統治者的「殖民記憶」講述成戰後「勞苦」的「遣返記憶」，殖民統治的責任與戰爭責任被混為一談<sup>10</sup>。因此，讓他們錯失了重新反省殖民侵略責任的機會。

相較於「終戰」、「原爆」的紀念出版活動等，有關遣返者的經歷卻相對較少受到關注。雖然在日本文壇曾出現過描述遣返者過程為題材的作品，例如藤原テイ的《流れる星は生きている》<sup>11</sup>和五味川純平的《人間の条件》<sup>12</sup>（京都：三一書房，1956-1958年）等暢銷書曾一時備受關注。然而，這個日人曾經歷過的集體東亞移動經驗，由於牽涉到戰後戰爭究責等政治性敏感議題，並未引起學界該有的重視。直到九〇年代後川村湊因研究滿洲文學，才提出「遣返者小說」和「遣返精神」的詞彙，2012年朴裕河再次提出「遣返者文學」這個概念：

我重新指出，在日本戰後文學中，有不少處理稱作遣返體驗及遣返體驗後遺症題材的「表現者」，因此想將他們的嘗試命名為「遣返者文學」。

<sup>8</sup> 同註7，頁7。

<sup>9</sup> 加藤聖文，〈台灣引揚と戦後日本人の台湾観〉，收於台灣史研究会部編，《台湾の近代と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2003年），頁122-147。

<sup>10</sup> 淺野豐美，〈折りたたまれた帝国—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引揚」の記憶と戦後的価値〉，收於細谷千博、入江昭、大芝亮編，《記憶としてのパールハーバ》（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年），頁273-513。

<sup>11</sup> 藤原テイ，《流れる星は生きている》（東京：日比谷出版社，1949年）。

<sup>12</sup> 五味川純平，《人間の条件》（京都：三一書房，1956-1958年）。

思考戰後日本和日本文學時，「遣返者文學」將會是很重要的立足點。<sup>13</sup>  
(筆者譯)

遣返者文學因此重新受到學界的關注，在日本現代文學中的「遣返者文學」隱含著日本敗戰的歷史烙印，被遣返者即使回到故里或移居他鄉重新生活，因深怕受到周遭的歧視，自身亦不願再提及曾經歷過的殖民地經驗。在戰後的日本社會中他們的原體驗和歷史記憶受到某種程度的壓抑，表面上他們從「外地」回到「內地」的空間，接受「日本帝國崩壞」的時間，但實際上卻繼續保有「帝國」時代的記憶，與「戰後日本」社會出現格格不入的現象，成為尷尬的「在日日本人」抑或「異鄉人」。<sup>14</sup>尾崎秀樹曾轉引五木寬之的自白：「所謂「異鄉人」並非只是觀念上的問題，阿爾及利亞生長的法國殖民者，對於國籍上的祖國的隔閡感，且又被生長的風土的土地所拒絕。懸空的人們，作為遣返者的卡謬的立場莫非就是如此。」<sup>15</sup>闡述這一代「非英雄性光榮逃脫」的遣返派文學者的心境，揭露深藏在他們內心對日本祖國的虛妄感和喪失「故鄉」的失落感<sup>16</sup>。

雖有部分在台日人作家戰前夕業已提早返日，但大多數都是在台獲知日本敗戰的消息，經歷被遣返的旅程。重返戰後日本社會後，他們備嘗人間冷暖，誠如西川滿的小說〈地獄的谷底〉中女主角的陳述：

在戰後的台灣，只要說出自己日本人，就算彼此不認識也會互相幫助。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想像回到日本後，同胞們應該會對我們伸出援手吧！畢竟彼此都是敗戰國的兄弟們，結果全部都是自以為是，太過天真了，甚至連有關係的同胞也都不理不睬。<sup>17</sup>（筆者譯）

<sup>13</sup> 崔佳琪，〈滿洲引揚げ文学について—研究史の整理及びこれからの展望—〉，《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第55號（2012年12月），頁52。

<sup>14</sup> 朴裕河，〈「引揚げ文學」を考える〉，《日本近代文學研究》第87號（2012年11月），頁116-122。

<sup>15</sup> 五木寬之，〈長い旅への始まり——外地引揚者の発想〉，《深夜の自画像》（東京：創樹社，1974年），頁37。

<sup>16</sup> 同註4，頁323-324。

<sup>17</sup> 西川滿，〈地獄の谷底〉，《台灣脫出》（東京：新小説社，1952年），頁125。



這群在台日人作家中，西川滿是少數仍堅持留在東京文壇繼續鬻文維生的人，其他的人幾乎都先返鄉安頓家人生活，等待生活穩定後才又重新投入地方區域性的文化活動。

另一位戰後日本知名的偵探小說家日影丈吉（1908-1991），在 1944 年曾以軍人的身分被徵召來台，1946 年 3 月在台除役返日，戰前他雖未參與過台灣文壇的活動，但返日後三年的台灣經驗卻成為他創作的「原體驗」，因為：

戰爭時只待在台灣三年。但總覺得當時在那裏的自然和人們皆處於未曾停滯不斷流動的真實狀態。只經歷過清晰可辨，時間快速流逝的記憶，不斷被死亡危機挑釁的時間。包括活在那裏的自己，因為全瞭然於目，而沒有悠閒和放空的時間。不。死和愛的問題更無需贅言。因此，台灣對我而言不只是回憶之地。<sup>18</sup>（筆者譯）

他以台灣為小說舞台發表了十幾短篇和兩篇長篇作品，其中深藏作家的反戰意識<sup>19</sup>。同時，在這些作品中也隱藏著作家的鄉愁之音，而這些鄉愁卻蘊藏著殘忍的內在本質，即是「沒有機會回想，印象將逐漸模糊」的過去記憶，得經常回溯。因而與其說它是種甜蜜，不如說是他對所執著的時間的深切復仇<sup>20</sup>。這樣殘忍的內在本質，也深刻地殘存於戰後仍執意書寫台灣的西川滿文本之中，即使舊帝國的時間已不復存在，他唯有不斷書寫才能保有個人的台灣記憶。

從明治領台以來日人作家對於台灣原住民的題材一直深感興趣，但依作家各自的創作動機和寫作視角生產不同的文學類型。戰後返日的坂口禰子延續她戰前的「蕃地」書寫，1953 年在丹羽文雄主持的同仁雜誌《文學者》（第 37 號，1953 年 7 月）發表她戰後第一篇以原住民為題材的作品〈比基的故事〉。之後，她又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的作品，都是以描寫戰爭末期疏散避難山區中原的原住

<sup>18</sup> 日影丈吉，〈序〉，《華麗島志奇——日影丈吉未刊短篇集成》（東京：牧神社出版社，1975 年），頁 1-2。

<sup>19</sup> 姚巧梅，〈日影丈吉の〈崩壊〉と台湾〉，《大漢學報》第 22 期（2007 年 12 月），頁 1-21。

<sup>20</sup> 草森紳一，〈時間の復讐・風景の悪意〉，《華麗島志奇——日影丈吉未刊短篇集成》，頁 322-330。

民舊識與「蕃地」景觀，其中〈蕃地〉（1953）一作更榮獲新潮社文學獎，同時〈蕃婦口ポウの話〉（1960）亦曾入圍過芥川獎<sup>21</sup>。

與坂口文學風格迥異的西川滿也敏銳地掌握當時日本大眾文學的流行趨勢，以描寫台灣的表象為手段，成就大眾小說的趣味性與娛樂性，積極地處理充滿異國情調的台灣原住民題材，發表了〈蕃地〉、〈蕃女〉、〈パイワンの饗宴〉、〈蕃歌〉等作品。但其內容大都將原住民部落傳說與奇風異俗文學化，至於人物的心理與現代文明對部落文化的衝擊等矛盾性的問題，他顯然欠缺如坂口在部落生活的真實感和戰後的贖罪意識<sup>22</sup>。

在帝國瓦解後經歷美軍占領時期，日本社會很快就遺忘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直到後冷戰時期因為美國東亞布局的調整，美援陸續撤出台灣，日商重新以企業投資的方式重返舊殖民地，部分的被遣返者此時才藉機覓得來台的機會。八〇年代末隨著日本經濟體的海外擴張，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日本社會開始關注舊殖民地戰後的社會文化發展情況，出版界陸續翻譯台、韓的當代文學，關心東亞社會戰後的發展。

綜覽在日本戰後出版的《昭和戰爭文學全集》（第12卷《流離の日々》，1965年）、《生きて祖国へ》（全六冊，國書刊行會，1981年）中<sup>23</sup>，卻都未曾收入與台灣相關的作品，戰後遣返者文學中「台灣」顯然又再次被遺忘了。因此，若理解帝國崩解後日本文學的發展全貌，不應忽略日本作家書寫台灣原體驗的文本，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面對日本東亞擴張所帶來的歷史傷痕。

### 三、戰後西川滿的文學活動

西川滿和濱田隼雄是戰爭末期在台灣文壇中最為活躍的在台日人作家，但日本敗戰後，兩人立即攜家帶眷隨成為第一批被遣返歸國的在台日人。他們於1946年4月9日從基隆港出發搭乘美軍Liberty型運輸艦返國，13日抵達日本

<sup>21</sup> 小笠原純，〈坂口禊子的1945體驗及其戰後寫作：一個「蕃地」作家〉，收錄於謝政諭等主編，《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台北：允晨出版社，2015年），頁483-498。

<sup>22</sup> 同註19，頁494-495。依據小笠原純對坂口〈蕃地〉的分析，坂口戰後不斷自我反省，抱著強烈地罪惡感面對自己的蕃地寫作。

<sup>23</sup> 同註13，頁40-44。

和歌山的遣返港口田邊。登陸後，濱田於 4 月 16 日回到故鄉仙台展開他新的生活<sup>24</sup>。西川滿返日後並未選擇返鄉，而是輾轉流離依親，前後住過山梨縣、池袋、足利等地。1946 年 6 月落腳他在阿佐谷的「台灣引揚寮」（遣返者的收容所），重新展開他的寫作生活，為求養家餬口只能在擁擠嘈雜的生活空間中振筆疾書。在台期間的摯友版畫家宮田彌太郎 1947 年也隨之後搬進「台灣引揚寮」繼續創作。西川滿一家人因購得新居於 1948 年 9 月 23 日才搬離收容所，結束遣返者的生活<sup>25</sup>。

戰後日本文壇的狀況大致可以歸納為三種類型：一是戰前資深作家復出，其後繼者如丹羽文雄、石川淳等人的風俗小說、中間小說相當風行。二是、由舊普羅文學系的作家以民主主義文學的形式再出發。三是、運用新方法意識的戰後派文學的登場<sup>26</sup>。西川滿返日後的文學活動，則與第一種類型的作家往來較為密切。

西川滿返日後，利用他在台期間寄贈《文藝台灣》所建立的人脈關係和累積的社會資本，因林房雄的提攜而以〈會真記〉（1948）一作入選夏目漱石賞佳作。又，因結識戰前曾多次訪台的長谷川伸<sup>27</sup>，受邀加入他主持的新鷹會。隨之，西川也寄稿至長谷川的義弟島源四郎所經營的新小說社發行的《大眾文藝》。在當時日本大眾文學的市場裡，該誌的發行情僅次於文藝春秋社的《オール讀物》和《別冊文藝春秋》，是本知名的大眾文藝雜誌。西川在《キング》發表以遣返經驗為題材的作品〈地獄的谷底〉一作，入圍第二十二屆的直木賞，建立他在當時大眾文學的立足點<sup>28</sup>。另外，他也在新鷹會的例會上代讀引薦濱

<sup>24</sup> 松尾直太，《濱田隼雄研究：台灣遣返作家的文化活動（1946-1962）》（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 年），頁 14。

<sup>25</sup> 西川滿，《わが越えし幾山河》（私人裝訂版），頁 41-49。根據西川潤教授於 2014 年 2 月 4 日於早稻田大學大隈會館接受筆者口訪的內容：滿之所以選擇定居在阿佐谷主要是因為中央線的交通便利，當時的文友也大多居住附近的沿線上。

<sup>26</sup> 平野謙，《昭和文學史》（東京：筑摩書房，1975 年），頁 260。

<sup>27</sup> 根據《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長谷川伸曾多次訪台，最早於 1934 年 1 月與多位日人大眾作家訪台。1938 年 12 月參加筆部隊前往南支那時過境台灣。1941 年 7 月應台灣總督府之邀與村上元三等人來台為期一個多月，期間甚至前往花東地區進行電影取材等活動。西川滿在台期間亦曾寄贈《文藝台灣》給長谷川，因而在《文藝台灣》的「諸家芳信」中看到長谷川的回應。

<sup>28</sup> 和泉司，〈「引揚」後の植民地文学—1940 年代後半の西川滿を中心—〉，《藝文研究》第 94 號（2008 年 3 月），頁 63-81。

田隼雄的稿件<sup>29</sup>，西川滿在《大眾文藝》上連載〈ちょらん島漂流記〉時，邀請立石鐵臣繪製插圖。除了戰前的在台日人之外，他也照顧旅日台籍作家，他受邱永漢之託在新鷹會的例會中朗讀〈偷渡者的手記〉，這篇作品備受到山岡莊八先生與村上元三先生讚賞，順利地在《大眾文藝》刊出，成為邱永漢進入日本文壇一個重要的契機<sup>30</sup>。返日後的西川滿在東京仍熱心地為台灣關係者尋找文學發展的空間。

西川滿返日後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並非是文學創作集，而是在中山省三郎的協助下，將在台已完成的譯作《西遊記（百花之卷）》（東京：八雲書店，1947年5月）再出版<sup>31</sup>。1948年西川才由新小說社出版創作集《七宝の手筐》<sup>32</sup>，隔年又出版《中國妖豔小說集》<sup>33</sup>。1952年他始以「台灣」為名出版了文庫本《台灣脫出》<sup>34</sup>。

筆者根據中島利郎的《西川滿全書誌》<sup>35</sup>，大致歸納出西川滿戰後主要的三種題材：1.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與改寫、2.台灣書寫（原住民族和漢族）、3.日本遣返者的書寫。《台灣脫出》所收入的五篇作品正好涵蓋這三種主要的類型。其中，〈雙蝶記〉是改寫自中國古典梁祝的作品；〈青鯤鯨的豔婆〉是以台南為小說舞台，以聖母像為物件和媽祖廟為宗教神秘空間所撰寫的作品；〈蕃歌〉是以日人較為熟知的霧社事件為題材的作品；〈地獄の谷底〉是西川返日後重新關注日本社會現實的遣返者文學。其中，〈台灣脫出〉據說是他以新垣宏一離台前的見聞為題材，所撰寫的作品<sup>36</sup>。上述的第一、二類型是延續戰前的文學題材類型，第三類是他返日後新發展出來的題材類型。

<sup>29</sup> 松尾直太，〈引揚後の濱田隼雄の中央志向をめぐる考察〉，第26屆天理台灣學會（2016年7月4日），頁63-68。

<sup>30</sup> 邱永漢，〈相識六十年〉，《淡水牛津文藝》第3期（1999年4月），頁56。

<sup>31</sup> 西川滿早在1940年—1943年就已改譯《西遊記》連載於台灣日日新報社的《國語新聞》之上，之後，改刊於《皇民新聞》，由台灣藝術社集結成五冊發行，返日後他將其中的一部分以單行本發行。1952年1月25日再由新小說社以文庫本發行。

<sup>32</sup> 西川滿，《七宝の手筐》（東京：新小說社，1948年）。

<sup>33</sup> 西川滿，《中國妖豔小說集》（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9年）。

<sup>34</sup> 西川滿，《台灣脫出》（東京：新小說社，1952年）。

<sup>35</sup> 中島利郎，《西川滿全書誌（未定稿）》（大阪：中國文藝研究會，1993年）。

<sup>36</sup> 新垣宏一著，嘉玲譯，〈美麗島文學〉，《淡水牛津文藝》第4期（1999年），頁31。「我因殘留在台而親眼目睹了二二八事件。於離台返日後，將其經過報告給西川，西川則以此為題材寫了〈台灣脫出〉這部作品吧。」

戰後他仍延續戰前浪漫想像的文學風格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興趣，翻譯改寫許多中國古典白話通俗小說的翻案性作品，這些作品的題材多出自於中國古典通俗小說等。戰前西川滿的女性書寫都帶有一種詭異的神祕性，戰後他仍執著於刻畫各種類型的女性形象，舉凡美女、俠女、狐女、女鬼、花娘、艷婆等（非村姑農婦），型構出另一種想像大於寫實，在異國情調中帶上神秘面紗的女性形象，藉以彰顯他的獨特的浪漫美學。帝國崩解後迫使他得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問題。在他的作品中也同樣顯露出當時被遣返者內心無以為告的剝奪感，猶如〈地獄的谷底〉的女主角的宣告：「我的青春之夢，已和台灣一起宣告永遠的終結。」<sup>37</sup>然而，相較其他區域返日的作家，他的遣返經歷似乎平和許多，對台灣的思念之情也表現得更露骨。

西川滿返日後之所以能與日本文壇順利接軌，除了貴人相助之外，與他本身獨特的浪漫主義和異國情調的文學特質有關。因為這樣的特質弔詭地降低了他重返日本文壇的門檻。然而，這樣的無縫接軌卻導致他的文本出現的遣返「被害」意識過剩與對殖民地時期在台日人的「加害者」意識欠缺深刻反省與自覺的問題，其文本的時間仍滯留於舊帝國的時間裡。如果比較西川滿戰前、戰後的台灣書寫最大的差異，在於台灣時期書寫論述「台灣」本身是有其建構「外地文學」的目的性；但返日後在他的文本中，「台灣」充其量只不過是他展演異國氛圍與非日常性的舞台裝置而已<sup>38</sup>。然而，若檢視「作家」書寫台灣的內在本質性的動機，其書寫的本身即是他存取日本敗戰「舊帝國記憶」與「台灣鄉愁」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將他在台期間對台灣民間信仰與宗教儀式的台灣知識攜帶返日，成為他重返文壇的文化資本，終其一生執著對「台灣故鄉」的憧憬和追憶，將作品奠基於他曾努力研究過的台灣歷史、風土民情、宗教信仰與儀式等的文化知識上，藉以延續他的文學生命和保存屬於在台日人的台灣「鄉土」記憶。

然而，戰後的日本社會急速地遺忘舊殖民地台灣的記憶，如同急欲遺忘日本的敗戰記憶一般，藉以規避在東亞發動戰爭和殖民統治的責任。西川滿因

<sup>37</sup> 同註 17，頁 130。

<sup>38</sup> 同註 28，頁 78-79。

其文學傾向和對題材的執著，在日本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逐漸欠缺新鮮感，讀者也隨之流失。因此，他不得不選擇轉向發展個人詮釋神祕宗教世界現象的興趣。

西川滿的文學欠缺社會寫實與現實的生活感，只重視文學美感與趣味性的問題，在戰前台灣文壇早已備受攻訐。然而，這樣的文學特質卻讓他順利跨進戰後日本大眾文學界的門檻。戰後當他卸下殖民者的政治性身分，他所書寫具大眾文學特色的後殖民文本，以翻譯文學的形式重返殖民地台灣時，又遭逢到怎樣的質疑？譯者又如何力圖淡化西川滿戰前的政治性色彩，讓他重新以「日本作家」的身分在台灣文學界現身呢？

#### 四、戰後西川滿文學在台的翻譯接受史

台灣跨語作家的翻譯文學，並非是單純的跨語際的溝通，其中隱藏著戰後台灣文化政治、歷史、殖民文化等複雜交錯的關係，雖然他們的譯作不見得居於當時文壇的中心或首要位置，但卻提供台灣文學多元論述許多重要的文本。七〇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後，他們為因應當時的左翼階級、抗日精神、台灣民族主義等論述的需求，積極扮演著翻譯者的角色，譯介戰前台灣日語作家的作品，這或許與台灣省籍作家的文學長期處於台灣文壇邊緣且弱勢有關。

解嚴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轉捩點，作家的創作題材也因之解禁，為了提供台灣文化多元來源的論述材料，他們也試圖將在台日人作家的作品譯出，將這些作品收編納入台灣文學的範疇，建構「多元系統」的文化內涵。在戰後如何回收這些前殖民統治者的文學文本進入「台灣文學」的範疇中，其過程與皇民文學的譯作一樣充滿爭論性。戰後研究者重新探討戰爭時期的文學文本時，台灣人的「皇民文學」早已爭論不已，更遑論翻譯、刊出西川滿的文學作品。直到九〇年代台灣出現文化多元來源的論述框架，才讓西川滿文學得以重新被包裝，成為散發台灣趣味與鄉愁的「翻譯文學」，重回台灣文學界。因此，本文希望重新回顧西川滿文學在台譯介的接受史，藉以釐清後解嚴時期西川滿譯本再生產的文化政治。

## （一）解嚴前西川滿文學的譯介

戰前西川滿在台曾擔任《台灣日日新報》文藝欄主編，編輯《愛書》、《媽祖》等，與總督府官僚、台北帝大教授們往來密切，在他們的支持下 1939 年成立台灣文藝家協會並主編《文藝台灣》，成為文壇的領導者。但，中山侑、張文環等人因對西川滿個人的領導風格深有不滿，集結其他台人作家，另創《台灣文學》，該文學集團多視他為「御用作家」。在戰後的台灣文學史中，西川滿也就此定型，成為備受批判的日人作家。戰後在日本的近現代文學史中，也一直未給予這群戰前海外日人文學家一個文學史上的歷史定位，因此川村湊以「異鄉的昭和文學」<sup>39</sup>重新評論偽滿洲國日人作家的文學活動，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亦受到關注。然而，在帝國政治版圖上的「異鄉」，在戰後卻是他們的心靈地圖裡回不去的「故鄉」，這種「喪鄉」的失落感成為這群日人作家在戰後無以為告的生命記憶與歷史傷痕。

台灣日語作家戰後憶及當時在台日人文學時，無論對西川滿或他的文學風格好惡與否，皆不得不論及他在台的文學活動和文學作品，畢竟他是日治時期少數專職寫作的作家，積極建構屬在台日人的「外地文學」，其創作質量亦不容忽視。龍瑛宗在五〇年代回顧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曾提及西川滿在台的文學成就，他將西川滿和濱田隼雄的文學評為最具典型特色「生長於台灣的日人文學」<sup>40</sup>。1956 年林曙光雖曾翻譯西川滿的中國歷史故事《殘忍的呂后》<sup>41</sup>，但卻未引起關注。七〇年代末本土意識崛起，島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譯介西川滿文學仍與當時的社會輿情和政治氣氛有所齟齬。張良澤雖譯出台灣民間傳說〈鴨母皇帝〉，但礙於當時戒嚴的政治情勢，最後無疾而終。當時葉石濤也反對譯出在台日人的文學<sup>42</sup>，但仍撰文介紹這位「在台日本作家」的文學活動，因為「他們雖對台人的抗日運動沒有任何幫助，但也未見有任何損傷，他們是一群天真的

<sup>39</sup> 川村湊，《異鄉的昭和文學——「滿州」と近代日本——》（東京：岩波書局，1990 年）。

<sup>40</sup> 龍瑛宗，〈日人文學在台灣〉，《台北文物》3 卷 3 期（1954 年 12 月），頁 18-22。

<sup>41</sup> 西川滿著，曙光譯，《殘忍的呂后》（台北市：龍門出版社，1956 年）。全書共 35 頁的小冊子，書中譯者未有任何說明。

<sup>42</sup>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 1979.8.22〉，《鍾肇政全集 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 年），頁 495。

人。對於這類型的作家，我們仍懷有深摯的懷念。」<sup>43</sup>顯然他對在台日人的文學成就並未全面否定。

八〇年代日人學者近藤正己在台發表〈西川滿札記〉<sup>44</sup>；張良澤繼之發表〈西川滿書誌〉<sup>45</sup>，整理西川滿的著作年表，試圖回歸作家研究，探討西川滿的文學軌跡與意義，重新評價西川滿對台灣文學發展的貢獻，肯定他是位「愛台作家」<sup>46</sup>。此舉隨即引來陳映真等人的批判，雙方在《文季》上展開激辯，展開第一次皇民文學的論爭<sup>47</sup>。之後，即使九〇年代西川滿的研究者無論如何試圖「排除非文學的論點」、「認定西川滿是日據時代在台灣殖民地居住、生活過的重要日人作家」<sup>48</sup>，皆難以翻轉西川滿殖民時期御用作家的形象。解嚴前西川滿文學的譯本並不多，論者經常未讀先判，西川滿也猶如地雷般，總是容易引爆來自不同立場的民族主義者對台灣皇民文學的批判。

除了張良澤之外，八〇年代葉石濤亦曾在「聯合副刊」上譯出西川滿的〈稻江治春詞〉文末葉評論到：「如他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浪漫、耽美傾向以及台灣氣味濃的異國情調。」<sup>49</sup>試圖淡化他作為殖民者的身分。直到解嚴前後葉石濤、陳千武才又重啟翻譯西川滿文學的作業。

## （二）解嚴後西川滿文學的翻譯

解嚴後台灣社會的日本觀已非單純的線性發展，因島內族群、語言、歷史經驗等因素，發展出多樣的台灣歷史敘事，抗日敘事只不過是眾多之「一」，但長期被壓抑的日語書寫卻以自傳、詩歌、日記、小說等的形式如怒濤般宣洩而

<sup>43</sup> 葉石濤，〈日人作家在台灣〉，《台灣日報》，1974年7月11日至16日。

<sup>44</sup> 近藤正己，〈西川滿札記（上）、（下）〉，《台灣風物》30卷3至4期（1980年9月、12月），頁1-28、80-130。

<sup>45</sup> 張良澤，〈西川滿書誌〉，《台灣文藝》第84期（1983年9月），頁157-165。

<sup>46</sup> 張良澤，〈戰前在台灣的日本文學：以西川滿為例兼致王曉波先生〉，《文季》2卷3期（1984年9月），頁16-27。

<sup>47</sup> 許南村（陳映真）的〈談西川滿與台灣文學〉，《文季》1卷6期（1984年6月），頁1-11，和張良澤的〈戰前在台灣的日本文學〉《文季》2卷3期（1984年9月），頁16-27。

<sup>48</sup> 陳明台，〈西川滿論：以其台灣題材之創作為中心〉，收於西川滿著，陳千武譯，《西川滿小說集2》（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頁320。

<sup>49</sup> 西川滿著，葉石濤譯，〈稻江治春詞〉，《聯合報》，1980年4月24日，第8版。



出。島內也陸續出現原住民運動與還我母語運動等族群運動的訴求，中華民族的國族論述也始見鬆動，「中華民族」的概念被「四大族群」所取代<sup>50</sup>。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戰前在台日人的文學找到了新的歷史出口，藉由翻譯文學的形式重被翻譯介紹。

戰後西川滿在日本雖以大眾文學作家的身分重新出發，但卻非知名大家，無法獲得台灣商業出版社的青睞而被譯介來台。然而，他卻是戰後在日本文藝界中最投入書寫台灣題材的日人作家。藤井省三將日本近代文藝界的「台灣熱」分成兩期：第一期是從三〇年代後半到日本敗戰 1945 年的十年間；第二期是 1947 年到六〇年代半的二十年間。西川滿從四〇年代到第二期皆以書寫台灣著稱，活躍於當時的日本文藝界，成為重要的跨時代台灣書寫者。另外，刊出西川滿作品的大眾文學雜誌書籍，出刊約莫有數十萬部的總量，其作品的讀者規模不容小覷，與西川同期刊出的執筆群中，也有多位已是當時文壇的知名作家，西川的作品並非全屬低俗之作<sup>51</sup>。但，戰後礙於台灣的政治禁忌和對日關係，西川滿文學在台的譯介依舊困難重重。

七〇年代末遠景出版社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1979)，和前衛出版社的《台灣文學作家作品集》(1991)，將台灣「皇民作家」和在台日人作家的作品排除在外，因為「民族意識」和寫實主義手法是這套書主要的選編標準。在文學史的論述裡，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1987)中對在台日人的文學活動著墨並不多，以「它是屬於統治階級的刊物，大多數台灣民眾都不諳日文的狀態下，它可能由一部分台灣知識分子所接受」，質疑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對當時台灣文壇的影響力<sup>52</sup>。2000 年後陳芳明撰寫《台灣新文學史》時，雖已出現不少西川滿文學的譯本，但在〈西川滿：皇民文學的指導者〉一節中他仍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將西川滿戰前文學定調為加害者的文學，強調他戰前的政治

<sup>50</sup> 黃智慧，〈台灣的日本觀解析（1987 年—）〉，《思想》第 14 號（2010 年 1 月），頁 53-97。

<sup>51</sup> 藤井省三，〈西川滿の戦後創作活動と近代日本文学史における第 2 期台湾ブーム〉，收於張季琳編，《日本文学における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4 年），頁 1-39。

<sup>52</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日譯註解版）（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 年），頁 102。

性身分<sup>53</sup>。「西川滿」這位作家在戰後之所以受到關注，並非是他的作品，而是拜戰後皇民文學論爭之賜。他總是以「御用作家」之姿，代表日本殖民統治者成為台灣評論者攻擊批判的箭靶。論爭的重點鮮少聚焦文學作品本身，最後批判往往指向撰稿者個人意識型態的問題。對此，西川滿似乎依然故我，未曾辯駁過或口出惡言。

1987年解嚴後台灣社會從「狂飆」的八〇年代邁向「混亂」的九〇年代<sup>54</sup>，台灣社會的言論自由更形開放，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致力於台灣文學「民族化」，建構所謂「建國的文學」。在此過程他們除了透過《台灣文藝》與《笠》詩刊的發行展開本土論述之外，還積極利用翻譯活動進行跨語跨時代的文化傳承。解嚴前後葉石濤、陳千武兩人開始積極譯出西川滿的作品，先後刊於具有本土色彩的《自由時報》、《自立晚報》、《台灣時報》等報紙的副刊之上。

西川滿戰後的台灣書寫仍延續他對台灣民間文化的興趣，作品中經常出現民間迎神賽會的場景和傳說信仰等敘事內容，藉以增添小說情節的懸疑性與宗教的神秘性。他的文學由於欠缺批判戰後日本社會現實問題的嚴肅性，也難直接讀出他戰後對日本殖民地統治的反省，大部分作品與戰前其文學被批評耽溺於浪漫想像等問題如出一轍。然而，這樣一貫欠缺社會現實感的文學風格，卻也讓他得以在台順利轉換成「日本作家」的角色，重現在九〇年代的台灣報紙副刊之上。

解嚴後台灣報禁隨之解除，各家副刊只能各憑本事在自由競爭激烈的報刊消費市場中，找尋生存或轉型之道<sup>55</sup>。根據林淇瀟的研究：九〇年代的報紙副刊，出現了既非「綜合副刊」、也非「文學副刊」、「文化副刊」那樣涇渭分明，而是與報業市場政策相隨，隨時調整它們適應讀者（市場）的內容。這種讀者取向的形式被稱之為「大眾副刊」模式，它反映的是「非傳統的、非菁英的、成批生產的、商業的、同質的」大眾文化的特質<sup>56</sup>。戰後西川滿的文學作品，

<sup>53</sup>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年），頁198。

<sup>54</sup>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收於楊澤主編，《狂飆八〇：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出版社，1999年），頁20-29。

<sup>55</sup> 王浩威，〈社會解嚴，副刊崩盤？從文學社會學看台灣報紙副刊〉，《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年），頁232-247。

<sup>56</sup> 林淇瀟，〈第三章「副」刊大業〉，《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1年），頁88。

之所以得以順利譯介至台灣的報紙副刊中，除了他的「台灣」因素之外，其作品的「大眾」文學特質與當時的副刊趨勢似乎有其不謀而合之處。副刊主編以「日本作家的台灣小說」、「淡水傳奇小說」、「橫渡黑水溝小說」等副標重新包裝西川滿的作品。至於作家的介紹方式，譯者則特別強調西川滿與台灣的淵源及其戰前的在台文化活動、文學成果等，最後提及他返日後對台灣的鄉愁與思慕之情。西川滿的文學活動大致可以分成三期：台灣期（1920-1945）、戰後期（1945-1960）、天后會台灣回憶期<sup>57</sup>。葉石濤主要負責譯介台灣期的作品，陳千武負責翻譯他戰後期的作品為主。他們依循一貫的譯作生產模式，將報紙副刊的譯作後集結成冊出版，於1997年由春暉出版社出版《西川滿小說集（1）》（葉石濤譯）和《西川滿小說集（2）》（陳千武譯）並附上西川滿的序文及其他學者的評論，希望延長西川滿文學的閱讀時效。兩人都是台灣重要的跨語作家，戰後積極地從事東亞區域內台、日、韓的文學翻譯工作，葉石濤以譯介小說和日人的台灣文學研究論著為主，陳千武則以翻譯現代詩和兒童詩為大宗。解嚴後為因應台灣本土論述之需，他們的譯作除了提供重構台灣文學的譯本之外，也試圖開展東亞區域內的文學交流。葉石濤在八〇年代已開始著手翻譯日人台灣文學研究、日本推理小說、韓國文學等作品，累積相當多的譯業和翻譯文學作品的信心。解嚴後他仍積極地從事翻譯工作以賺取譯稿費，維持生計，他除了譯介日本作家的作品之外，也開始譯介戰前在台日人作家的作品，並為讀者導讀評介這些作品。

葉石濤雖與西川滿曾有過一段師生情，但他仍很謹慎地處理西川滿文學的問題，即使是九〇年代他翻譯戰爭期的《台灣文學集 1：日本作品選集》時，仍似有顧忌地強調台灣被殖民的歷史傷痕，例如在濱田隼雄的〈蝙蝠〉的「譯者按」中特別指出主角陳少年的奴性與日本統治者的優越感，在物質匱乏的戰爭年代裡日台的差別待遇等。但他也刻意表達他的譯者立場：

即使是日本作家或台灣作家的日文作品，也是屬於台灣文學遺產的重要部分。四百年來台灣常被外來統治者統治，如果把所有外來統治者有關

<sup>57</sup> 同註 30。

台灣的文學作品排除於台灣文學之外，那麼清朝統治台灣二百二十年的舊文學中許多中國宦遊文人的傑作也必須排除在外，這難道不是荒謬的事嗎？我們必須以世界性的宏觀立場來接納這些作品，我之所以翻譯西川滿先生的小說，也是出於這善意罷了。

(中略)

畢竟台灣人曾經是日本統治、經濟、文化侵略的受害者，這種被損害的記憶流在血液裡，變成台灣人恥辱的血肉的一部分。<sup>58</sup> (下線筆者)

顯然他並非純然為「翻譯」西川滿文學而翻譯，他試圖強調翻譯者選擇的主體性與重新建構台灣文學內涵和作品的歷史意義。他站在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立場，將日本與中國皆視為外來政權，西川滿的文學同樣是外來「統治者」的文學，但他卻釋出「善意」，以「世界性」的宏觀立場來回收西川滿的台灣書寫。

### (三) 陳千武譯介西川滿的遣返者文學

西川滿 1933 年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在恩師吉江喬松的鼓勵下返台，再度踏上台灣的他「以後數年，貪婪地在探索台灣的歷史中度過。」<sup>59</sup>返台後的他深受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的啟發與影響，試圖建構在台日人的鄉土文學，積極撰寫以台灣為題材的歷史小說，例如鐵道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採硫記》、《龍脈記》等。這些文本題材奠基在既有的台灣文獻史料之上，除了呼應戰爭末期國策書寫之外，其中仍充滿西川滿個人獨特的文學想像與歷史詮釋。然而，這類帶有建構在台日人鄉土文學的使命感和充滿戰時帝國意識的歷史書寫，隨著西川滿的返日也隨之告終。

西川滿遣返後的作品主要由陳千武負責譯出，並收入於《西川滿小說集(2)》。其中，除了〈赤嵌記〉之外，都是西川被遣返後沒多久發表於《新讀物》、《コメット》、《講壇俱樂部》、《キング》等通俗雜誌之上的短篇作品，後來集

<sup>58</sup> 濱田隼雄著，葉石濤譯，〈蝙蝠〉，收於葉石濤編譯，《台灣文學集：日文作品集》(高雄：春暉出版社，1996年)，頁130-131。

<sup>59</sup> 西川滿，〈歷史のある台灣〉，《台灣時報》2月號，1938年2月，頁66。

結成《神々の祭典》（東京：人間の星社，1984年），其中的作品多以「台灣」的大稻埕、鹿港、台南古都為小說舞台，深具傳奇性色彩。

翻譯者陳千武（1922-2012）台中州南投人，1935年考入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學，1939年發表第一篇日文詩作〈夏深夜の一刻〉於《台灣新民報》（1939年8月27日）後陸續在該刊報上發表詩作。1941年畢業後任職於台中製麻株式會社。1942年7月台灣總督府公布「台灣特別志願兵制度」，因被選入第一期「陸軍特別志願兵」。受訓後1943年9月赴南洋參加濠北地區防衛作戰。1945年敗戰後，部隊受英軍指揮，轉而參加印度尼西亞獨立軍作戰。1946年4月在印尼雅加達的集中營發起「明台會」，6月起主編《明台報》但隔月隨即返台。12月返台後考進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擔任人事行政工作。1958年才發表他第一篇中文詩作〈外景〉<sup>60</sup>，並開始以筆名「桓夫」發表作品。六〇年代就開始譯介台、日、韓詩人的作品和詩論，參與東亞詩人團體的交流活動，在八〇年代初藉由「翻譯」讓「日治時期新詩傳統」再現<sup>61</sup>。

1965年陳千武因寄贈《笠》詩刊給日本靜岡縣圖書館的葵文庫而結識高橋喜久晴，與村野四郎、北川冬彥、田村隆一等日本知名詩人，並與各詩刊主編的各務章、古克彥、南邦和等人，藉由譯作通訊、互訪聯繫，搭起兩國詩學的交流平台網絡。隔年1966年在靜岡詩人會報中，他又結識韓國詩人李沂東，輾轉結識韓國重要詩人金光林，並藉信箋往返，進行詩刊與譯詩的交流。1980年10月因參加「東京國際詩人會議」，與高橋喜久晴、金光林三人商議決定三國輪流編纂《亞州現代詩集》，同時輪流召開「亞洲詩人大會」，1982年在台北召開「中日韓現代詩人會議」，陳千武透過「翻譯」活動積極推動台灣新詩的國際化<sup>62</sup>。

除此之外，他也在北原政吉（1908-2005）的引薦下，認識了熊本市もぐら書房的負責人宮崎端。宮崎端1921年出生於嘉義，1941年前往東京升學。戰前他曾加入《文藝台灣》並發表過小說〈赤城山埋藏金〉<sup>63</sup>。戰後他仍與雜誌

<sup>60</sup> 陳千武，〈外景〉，《公論報》第182期，1958年1月10日。

<sup>61</sup> 羊子喬，〈論陳千武的翻譯、文學交流與建構〉，《文學台灣》第66期（2008年4月），頁207-222。

<sup>62</sup> 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4年），頁220-224。

<sup>63</sup> 宮崎端，〈赤城山埋藏金〉，《文藝台灣》6卷6號（1943年11月），頁118-127。

同人北原政吉、本田晴光等人往來密切，並出版他們的詩集<sup>64</sup>。龍瑛宗戰後發表的第一篇日文小說〈夜の流れ〉亦刊於該書房發行的雜誌《だぁひん》<sup>65</sup>。1977年8月上旬宮崎端、北原政吉與當時《笠》詩社社長陳秀喜、陳千武等人會面後，促成《台灣現代詩集》的譯介工作，於1979年2月由該書房出版，1989年5月又出版了《續·台灣現代詩集》。陳千武與這群作家時有書信往來互動密切，並陸續譯介他們的作品到台灣文學界，例如岬たん（宮崎端）的〈林玉蘭的徵召令〉、〈垃圾鬼〉，台中一中的同窗平井克郎的〈海上墓碑〉、西川滿的〈裸神的饗宴〉等。

陳千武是少數親身經歷戰時海外前線戰況種種，經歷戰火的洗禮後能夠平安返台的台灣作家。他對於戰時人們面對戰爭的軟弱與無可奈何的心境，保有深刻的理解與包容力。因此，他雖耳聞許多有關西川滿的負面評論，但因為「西川氏敢說他那麼愛台灣，用他的文學構造台灣美醜、善惡分清的知性令人感動。」<sup>66</sup>，讓他自覺沒有討厭西川滿的資格，試著接納、翻譯他的文學作品。當他閱讀刊於《Andromeda》的重刊舊作〈劍潭印月〉、〈血染鎗樓〉、〈赤嵌記〉三篇小說時，發現西川滿以台灣各地不同的地方歷史傳說為題材，充滿著濃厚的民俗趣味，引發他譯介的興趣。在翻譯的過程中，對於西川處理小說情節幽美的思維及技巧，應用其特有的浪漫美文表現出獨特的魅力，且含有淨化人心的文學意象而深受感動。因此，他認為這些「它山之石」應有其值得借鏡之處，利用訪美度假的兩個月假期一口氣譯出《神明祭典》的十篇<sup>67</sup>。

然而，翻譯的底本《神々の祭典》中雖收有十四篇短篇小說，但陳千武卻只選譯其中以台灣古都「一府二鹿三艋舺」作為小說舞台的作品，遣返後的第一作〈青衣女鬼〉和描寫女海賊〈豹之花〉、查某嫺的〈花娘夜語〉、描寫淡水歌仔戲劇場的〈天女散花〉皆未選入其中。但是，在1994年二二八事件的前夕，陳千武卻刻意譯出西川滿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撰寫的〈惠蓮的扇子〉的短篇小

<sup>64</sup> 承蒙中島利郎教授提供もぐら書房等《文藝台灣》同人之相關研究資訊，謹此誌謝。

<sup>65</sup> 《だぁひん》(DAHIN)到彼方的意思。由宮崎端のもぐら書房所編輯發行的年刊文藝誌。自1975年至1979年共發行五期。

<sup>66</sup> 陳千武，〈西川滿印象〉，《文學人生散文集》(台中市：台中市文化局編印，2007年)，頁121。

<sup>67</sup> 同註66，頁116-122。

說<sup>68</sup>。西川滿 1946 年便返日，並未親眼目睹 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其寫作動機據說是聽聞友人受難而讓他悲傷憤怒不已，在 1954 年 2 月於《台灣民聲》創刊號上發表二二八詩歌〈丈夫和大地的憤怒〉<sup>69</sup>。另外，他也根據新垣宏一的二二八經驗寫了〈台灣脫出〉一作。這些作品可算是台灣二二八事件文學書寫的先聲，亦是他少數顯露他戰後政治意識的異色作品。

陳千武試圖藉由「翻譯」西川滿文學，揭示作品中台灣民間傳說、民俗祭典與歷史空間的文學再現形式，彰顯作品中台灣「鄉土」的符碼。關於西川滿戰後的遣返經驗書寫和中國古典文學的改寫等類型卻被摒除在他的譯介活動之外。他藉由譯作讓台灣讀者跳脫對台灣民間傳說、祭典題材既定的「鄉土文學」論述框架，重新發現這些曾被鄙視的庶民題材，經由作家的文學想像是如何昇華為另類的文學文本，同時也滿足九〇年代後台灣讀者另一種鄉土懷舊情愫的閱讀需求。

戰後在皇民文學論爭中對西川滿的批判大都聚焦於殖民者的歷史身分，卻鮮少觸及殖民地經驗的遺緒（legacy）書寫。西川滿返日後在其文本中仍不斷表達離台的無奈，瀰漫著濃濃的台灣鄉愁，「本想要永住下去的台灣，不得被遣回」<sup>70</sup>（〈煉金術〉，頁 188）。在〈惠蓮の扇〉<sup>71</sup>中藉由主角「我」和「仲明」兩人的辯詰，表達在台日人對國民黨政府戰後接收台灣的不滿，文本中似乎仍潛藏著西川滿肯定舊帝國殖民統治的文化遺緒。然而，翻譯者對於西川滿曾是殖民者的政治身分卻欠缺說明，只聚焦於文本中「台灣」題材的文化意義上，忽略作者的文本產出的歷史脈絡和西川滿戰前的政治立場。對此施淑也從「台灣人」的立場評介這本譯作，提醒讀者：

日據時代曾被奉為「外地文學」（殖民地文學）樣板的西川滿，他戰前戰後始終不渝地書寫台灣、描繪台灣的熱情和文學志業，固然應予尊敬，我們也確實從他的作品找回漸次失落了的台灣的記憶。但他這些在敘述上始終不容台灣人發音，在活動上，把台灣風土人情一貫限制在哥特式

<sup>68</sup> 陳千武雖譯出西川滿的〈裸神的饗宴〉（原住民題材），《台灣時報》，1994 年 9 月 10 日，但卻未選入該譯本集。

<sup>69</sup> 岡崎郁子，〈西川滿先生和二二八事件〉，《淡水牛津文藝》第 4 期（1999 年 7 月），頁 71-72。

<sup>70</sup> 〈煉金術〉，《神々の祭典》，東京：人間の星社，1984，頁 188。

<sup>71</sup> 西川滿，〈惠蓮の扇〉，《アンドロメダ》第 250 號（1990 年 3 月），頁 7。

情境的作品，卻像一切殖民主義文學一樣，宣示著被殖民者的奴隸式的社會性死亡（Social death）。而這應該是我們在認識台灣，重建台灣文學史時不能不認識到的問題。<sup>72</sup>

施淑很清楚地點出西川滿文學以翻譯文學方式被迎回台灣時，以「認識台灣」為由的問題點，提醒台灣讀者西川滿文學欠缺社會性的問題。作家藏諸作品中的在台日人的「鄉愁」意識與翻譯者重建台灣文學的「鄉土」意識之間的齟齬，正突顯了翻譯的悖逆性。換言之，譯者藉由強調這些作品的「台灣性」，卻無意識地遮掩了譯本潛藏的「殖民性」。

中島利郎在他的書評中試圖釐清西川滿文學在台的接受史，肯定西川滿文學與他對台灣新文學發展的貢獻。推崇西川滿是台灣歷史小說的開山祖師，認為這兩本翻譯集的出版具有西川滿文學的復權的象徵意義<sup>73</sup>。但是，西川滿文學的譯本顯然只是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選擇的「結果」，譯者對台灣鄉土題材的重視顯然更勝於為他找尋文學史上的定位。

返日後的西川滿因對國民黨政權有所顧忌，加上雙腳不良於行，即便在七〇年代早有部分灣生陸續來台探訪友人，但他卻未曾再踏上台灣，只能透過友人口述得知台灣友人的近況。反之，台籍作家張文環、龍瑛宗、鍾肇政、陳千武、杜潘芳格等人，戰後訪日時皆曾拜訪過他。戰前因為帝國殖民體制迫使他們在民族立場上必須站在彼此的對立面，但，戰後他們卻成為分享緬懷彼此文學過往的知音，因為他們的台灣記憶，在戰後的國家論述中都曾是不容辯說的過往。

相較於日本其他有過殖民地經驗的作家，返日後的西川滿似乎毫無顧忌書寫「台灣」，藉此來填補他心中失鄉的落寞。因此，在《西川滿小說集 2》的〈序〉：

〈赤嵌記〉以外的十二篇，是因日本敗戰，不得不離開我心裡決定的終身住家的台灣，我對已經成為遙遠的島抱持難於忍受的慕情，永不消失的讚頌，一天又一天，用力敲打似地寫出來的東西。（中略）這一卷是，

<sup>72</sup> 施淑，〈認識台灣西川滿文學現象〉，《中國時報》，1997年7月31日，第42版。

<sup>73</sup>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の日本人作家：西川滿文學の復權〉，《東方》第201號（1999年11月），頁37-40。



我以深摯的感情，獻給曾經允許我居住過、生活過，使我愛上的台灣  
——美麗島的小說集。<sup>74</sup>

戰後西川滿即使他不在場卻執意書寫台灣，「台灣」的文學符碼在他的作品中清晰可辨，但這樣被標籤化的結果，因東亞國際政治局勢的轉變，冷戰結束後日、台的外交關係逐漸疏遠，六〇年代以後他也不得不選擇從日本大眾文學的場域中退場。

這些譯本與解嚴後台灣本土文化論述之間的關聯性，主要著眼於文本中的台灣鄉土因素，西川滿殖民者作家的形象已悄然被轉換成「日本作家」。西川滿文學的通俗趣味性也相當符合九〇年代大眾副刊的走向，他雖是「日本」作家，但其小說敘事內容卻相當「台灣」而不見隔閡，讓他的翻譯文學得以順利隱身在報紙副刊上。

1998年張良澤在聯合副刊上擇譯了被稱為皇民文學的短詩文，並發表〈正視台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sup>75</sup>一文引發九〇年代的皇民文學之爭。其中，陳映真又再次點名西川滿為「台灣皇民文學頭號總管」<sup>76</sup>。雖然這一次的論爭同樣是統獨論述與左右立場之辯，「反共文學」與「皇民文學」被相提並論，由於九〇年代已累積了部分西川滿的翻譯文學，使得論述內容較言之有物。彭瑞金也利用葉石濤的譯作〈採硫記〉，與郁永河的〈裨海紀遊〉進行比較研究，以「屬地主義文學」的觀點將西川滿文學編織進入台灣文學的範疇中，進行文本的再生產活動<sup>77</sup>。對此，游勝冠同樣檢視批判研究者的意識型態，認為那是研究者「長年以來未曾加以清理的、心靈的殖民地化的一個鮮明的表現。」<sup>78</sup>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殖民地清理，也映照出台灣人面對清理在台日人文學的「困難」。然而，清理困難真正的癥結點或許並不在

<sup>74</sup> 西川滿著，陳千武譯，〈序〉，《西川滿小說集2》（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頁2。

<sup>75</sup> 張良澤，〈正視台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聯合報》，1998年2月10日，第41版。

<sup>76</sup> 陳映真，〈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評〉，《聯合報》，1998年4月2日，第41版。

<sup>77</sup> 彭瑞金，〈用力敲打出來的台灣歷史慕情：論西川滿寫〈採硫記〉〉，收於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頁12-28。

<sup>78</sup> 游勝冠，〈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徘徊：又見一場以皇民文學為焦點的論戰〉，《聯合報》，1998年7月24日，第37版。

西川滿文學本身，而是台灣人如何面對戰後自身的「日本症候群」<sup>79</sup>。戰後西川滿文學的譯作，顯然是文化民族主義者因應時代所需譯介的結果。戰後的台灣讀者所關注的，除了論者對西川滿帝國意識的批判之外。另一方面，西川滿如何將台灣民間文化透過文學的浪漫想像加以藝術化，「鄉土」如何可以不寫實，亦成為另一個閱讀關注的重點。

## 五、結論

台灣人在戰後經歷戒嚴與白色恐怖，殖民記憶被排除在國家集體的抗日記憶之外，在台日人的「被遣返經驗」與台人的「殖民經驗」同樣在戰後長期受到政治的壓力而被漠視，被視為「負面遺產」，個人記憶被掩蓋在國家集體記憶中，因此他們彼此之間存在著類似的情感結構。即使，他們之間存在著種族、階級的差異，這群在台日人的身上背負著帝國的歷史印記是無法褪脫的，跨語世代的譯者面對西川滿文學訴諸對台的望鄉思慕之情時，在個人的情感層次上，顯得多了一點同情的理解和包容。

西川滿戰後的台灣書寫仍維持他一貫的寫作風格，喜好使用台灣民間傳說的文化表象，創造神祕的異質空間，積極地在日本文藝界中書寫「華麗島」。戒嚴時期島內戰前殖民的歷史記憶和民間文化備受壓抑，台灣文化在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史觀下不斷地被邊緣化、被視如敝屣。然而，這些民間文化竟被西川滿以特殊的浪漫筆致，包裝得極具文學的趣味性和娛樂性。戰後台灣的政治氛圍與他殖民者的政治身分等因素，使得他的文學遲遲無法被正視和翻譯，直到後解嚴時期，才有系統地被逐一譯出。然而，重新檢視譯本類型，不難發現這些譯本的題材主要都是與台灣民間傳說和常民信仰有關，這顯然是翻譯者在九〇年代建構台灣文化主體性時，為強調台灣文化多元性所篩選的結果。因為這些西川滿文學的譯本既能滿足九〇年代報紙大眾副刊鄉土內容之需，又能滿足當時台灣的懷舊情懷和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論述之需。

<sup>79</sup> 汪宏倫，〈台灣的日本症候群〉，《思想》第 14 號（2010 年 1 月），頁 35-38。

翻譯者透過強調西川滿文學中的台灣鄉土性，試圖翻轉西川滿戰前既定的作家形象。然而，戰後這些後殖民的譯本並非是本土派主張的寫實主義的「鄉土」，而是充滿浪漫懷鄉的「鄉土」，「鄉土」成為作者與翻譯者最大的公約數，各取所需各解其意，翻譯者所背叛的並非語意的背離，而是因應文化政治之需，無視作者帶有舊帝國意識的創作意識，將閱讀重點置於鄉土的題材之上。在某種文化意義上西川滿也藉由這些譯作達到他重返台灣鄉土的目的，「鄉土」也因而成為九〇年代讀者重新閱讀理解西川滿文學的另一個可能的視角。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川村湊，《異鄉的昭和文學——「滿州」と近代日本——》（東京：岩波書局，1990年）。
- 中島利郎，《西川滿全書誌（未定稿）》（大阪：中國文藝研究會，1993年）。
- 日影丈吉，《華麗島志奇——日影丈吉未刊短篇集成》（東京：牧神社出版社，1975年）。
- 五木寬之，《深夜の自画像》（東京：創樹社，1974年）。
- 五味川純平，《人間の条件》（京都：三一書房，1956-1958年）。
- 王浩威，《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年）。
- 平野謙，《昭和文學史》（東京：筑摩書房，1975年）。
- 台灣史研究会部編，《台灣の近代と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2003年）。
- 朱天心，《古都》（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
- 西川滿，《七宝の手篋》（東京：新小説社，1948年）。
- 西川滿，《中國妖豔小説集》（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9年）。
- 西川滿著，陳千武譯，《西川滿小説集2》（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
- 西川滿，《わが越えし幾山河》（私人裝訂版，1983年）。
- 西川滿著，曙光譯，《殘忍的呂后》（台北市：龍門出版社，1956年）。
- 西川滿，《台灣脫出》，（東京：新小説社，1952年）。
- 林淇養，《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市：麥田出版社，2001年）。
- 尾崎秀樹，《旧殖民地文学の研究》（東京都：勁草書房，1971年）。
- 河原功，《台灣引揚者關係資料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社，2011年）。
- 細谷千博、入江昭、大芝亮編，《記憶としてのパールハーバ》（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年）。

- 陳千武，《文學人生散文集》（台中市：台中市文化局編印，2007年）。
- 陳明台，《台灣文學研究論集》（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年）。
- 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2004年）。
- 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
- 張季琳編，《日本文学における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4年）。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日譯註解版）（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年）。
- 葉石濤編譯，《台灣文學集：日文作品集》（高雄：春暉出版社，1996年）。
- 楊澤主編，《狂飆八〇：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出版社，1999年）。
-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12年）。
-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年）。
- 謝政諭等主編，《何謂戰後亞洲的 1945 年及其之後》（台北：允晨出版社，2015年）。
- 藤原テイ，《流れる星は生きている》（東京：日比谷出版社，1949年）。

## 二、論文

### （一）期刊論文：

-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の日本人作家：西川滿文学の復権〉，《東方》第 201 號（1999 年 11 月），頁 37-40。
- 羊子喬，〈論陳千武的翻譯、文學交流與建構〉，《文學台灣》第 66 期（2008 年 4 月），頁 207-222。
- 朴裕河，〈「引揚文學」を考える〉，《日本近代文學研究》第 87 號（2012 年 11 月），頁 116-122。
- 汪宏倫，〈台灣的日本症候群〉，《思想》第 14 號（2010 年 1 月），頁 35-38。

- 和泉司，〈「引揚」後の植民地文学—1940年代後半の西川満を中心—〉，《藝文研究》第94號（2008年3月），頁63-81。
- 岡崎郁子，〈西川満先生和二二八事件〉，《淡水牛津文藝》第4期（1999年7月），頁71-72。
- 邱永漢，〈相識六十年〉，《淡水牛津文藝》第3期（1999年4月），頁56。
- 姚巧梅，〈日影丈吉の〈崩壊〉と台湾〉，《大漢學報》第22期（2007年12月），頁1-21。
- 陳芳明，〈複數記憶的浮現：解嚴後的台灣文學趨勢〉，《思想：解嚴後的台灣文學》第8期（2008年1月），頁131-140。
- 崔佳琪，〈滿洲引揚げ文学について—研究史の整理及びこれからの展望—〉，《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第55號（2012年12月），頁52。
- 新垣宏一著，嘉玲譯，〈美麗島文學〉，《淡水牛津文藝》第4期（1999年7月），頁3。
- 許南村（陳映真），〈談西川満與台灣文學〉，《文季》1卷6期（1984年6月），頁1-11。
- 崔佳琪，〈滿洲引揚げ文学について——研究史の整理及びこれからの展望〉，《現代社會文化研究》55號（2012年12月），頁39-55。
- 張良澤，〈戰前在台灣日的日本文學：以西川満為例兼致王曉波先生〉，《文季》2卷3期（1984年9月），頁16-27。
- 張良澤，〈戰前在台灣日的日本文學〉，《文季》2卷3期（1984年9月），頁16-27。
- 黃智慧，〈台灣的日本觀解析（1987——）〉，《思想》14號（2010年1月），頁53-97。
- 龍瑛宗，〈日人文學在台灣〉，《台北文物》3卷3期（1954年12月），頁18-22。
- 蕭阿勤，〈追求國族：198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思想》第22期（2012年11月），頁85-110。

## (二) 學位論文：

松尾直太，〈濱田隼雄研究：台灣遣返作家的文化活動（1946-1962）〉（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

## (三) 會議論文：

松尾直太，〈引揚後の濱田隼雄の中央志向をめぐる考察〉，第26屆天理台灣學會（2016年7月4日），頁52-74。

## (四) 雜誌文章

西川滿，〈惠蓮の扇〉，《アンドロメダ》第250號（1990年3月），頁7。

近藤正巳，〈西川滿札記（上）、（下）〉，《台灣風物》30卷3至4期（1980年9月、12月），頁1-28、80-130。

宮崎端，〈赤城山埋藏金〉，《文藝台灣》6卷6號（1943年11月），頁118-127。

張良澤，〈西川滿書誌〉，《台灣文藝》84期（1983年9月），頁157-165。

## (五) 報紙文章

陳千武，〈外景〉，《公論報》第182期，1958年1月10日。

